

 | 谢晖法学论著系列

法的思辨与实证

谢晖 著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 谢晖法学论著系列

法的思辨与实证

谢晖 著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的思辨与实证 / 谢晖著.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5.6

ISBN 978 - 7 - 5118 - 8022 - 2

I. ①法… II. ①谢… III. ①法的理论—研究 IV.
①D9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1085 号

法的思辨与实证

谢 晖 著

责任编辑 周丽君

装帧设计 贾丹丹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开本 720 毫米×960 毫米 1/16

版本 2016 年 2 月第 2 版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校对 杨锦华

印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印张 25.5 字数 376 千

印次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编辑统筹 独立项目策划部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印制 张建伟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网址/www.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ISBN 978 - 7 - 5118 - 8022 - 2

定价:58.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谢晖：流浪的思想

——《法的思辨与实证》再版序

丽君来信告诉我：她决定把这部已经出版了十三年的书重新出版，期望我能够就内容进行修订，并征求我的意见，能否把涉及回族法文化的几篇文章删去，以新的论文替代？我答应了她的再版要求，尽管这部书之前已经重印过，但还是敝帚自珍，能够再行出版，让它力所能及地发挥可能的作用，对作者而言，总是期待的。但我没有同意再行修改或增删，只强调书中发现的错别字和明显的语法、修辞、逻辑以及常识错误肯定是会修改的。

之所以这样回复，是自从我步入学界以来，尽管心头想专心致志，从一而终，但笔头并不听心头使唤，自觉不自觉地会把一些“自专”之外的所思所想带到当下的、情境化的写作中。既往的写作，不但同样是情境化的产物，也是思想流浪路上的一点印记，所以，既无精雕细琢、十年一剑，藏之名山、以求不朽的志趣，也就没有对以往作品不断修改、推陈出新的想法。在我的作业中，除了对教材有这种想法和要求外，其他所有作品，只以记载一时一地的思想为宗旨，而不太关注对思想的刻意修葺，以保障自己的思想处于不断地流动、更新和流浪中，避免只及一点，不计其余；只顾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从而以一种开放心态保障对各家学说的关注、敬意或批评，也以流动的态度看待自己思想的变迁或者流浪。

关注我作品的人或许知道，我的学术兴趣，一直

在法哲学领域,即使近些年来对法律方法和民间法的关注,也没有背离这一兴趣太远。虽然已经出版的那些文字能不能算作法哲学和法律哲学的作品,尚可讨论,但我的致思趋向和追求,一直不离自己所认为的法哲学框架。无论是微博短语还是学术随笔,也无论是学术论文还是学术著作,都力求有自己观点或思想,不泥人云亦云,不拘既有成说。在这一宗旨下,我所关注、研究或思想的领域,却流动或流浪在以法哲学为前提的法制现代化、民间法、法律方法、宪政理论,甚至理论经济学、人类学和传统文化等极为广阔的学术地带。这样的研究,自然常常会流于浮泛,甚至浅薄,但对全方位认识所面对的问题,又不失深刻,至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避免盲人摸象那般的偏颇。

所以,让思想流浪,或许无法收获专心致志、咬定青山、“术业有专攻”的效果,但能增益登高望远、放眼人寰、“一览众山小”的情趣。何况思想对思想者而言是一种情趣,但对社会而言,或许不仅仅是情趣,也可能会阴差阳错地带给社会以思想教化、思维启迪、决策参考乃至人生指导等。因此,思想的流浪,对思想者而言是其人生道路和意义的组成部分,是观照思想者多面人生的流动窗口,也是其人生风景的连环画册。倘若拘泥于不断修改、日臻完善,虽可见精雕细琢的精致,但无法领略原始纯朴的本真。可见,流浪的思想,不仅是对思想的结果期待,而且是观照思想的流动过程。对已版论著过于裁减、雕琢和修订再版的不当之处,就在于容易遮蔽和省略思想者的思想过程,只看到业已成死水的思想结果。

或以为,比较原版和修订版之间的变化和差异,不也能看到思想者的思想变迁过程吗?诚然如是。但这种比较,仅仅对那些刻意研究某些思想者及其思想的人而言有用,对绝大多数读者而言,读了某一作品的原版,再去读其修订版的可能性甚少。而对接续原版探索的作品,阅读的可能性或更大。这种争取读者的考量,似乎过于功利化,但只要追求思想的传播,功利就是思想者不能舍弃的重要追求之一。抱着玩的态度对待思想,尽管完全可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思想创造和传播,但迄今为止,我们还很难找到哪位思想家是抱着玩的心态而创造出伟大的思想,并且播之广大、传之久远的;反之,我们所见到的思想家及其流传广大、久远的作品,往往是其笃定使命、精心构思的结果。即便像庄周、叔本华、尼采那般汪洋恣肆、激情澎湃的学术创作,也绝不是其抱着玩的心态而成就的;反之,怀着强烈社会使命感而著书立说,是这些思想者的普遍情

怀。他们的思想态度,在本质上是任思想随其认识而流浪。显见,对于不刻意追求在某一学术领域从一而终的学者而言,与其耗时费工修订其作品,不如任思想自由流淌、随心流浪,更容易让读者窥见一位思想者的思想轨迹和作业流程。

当然,思想的流浪更在于思想者无可避免地生活在主观世界和客观情势不断的动态碰撞中。这种碰撞或许是思想遇到了新事物、新经验、新领域,或许是思想对既有事物的认知产生了怀疑并因而转向新认识。只要思想不囿于自我禁闭的斗室,就必然流动在意识与事物的不断接触和碰撞中。这样说来,似乎没有永恒一贯的思想:没有原理、没有原则,也没有价值。其实,在这种原理、原则和价值缺席的表面背后,却横亘着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精神,那便是思想是自由的。流浪的思想就是自由的思想,就是面对时空,又不受时空拘限的思想。

要面对时空,是说任何自由流浪的思想,都是时空的产物,是思想者面对时空思索和创造的结果。即便一位思想者一生只生活在自己设置的小小围城里,像康德那样,足不出城,但自由的思想照例能够仰望星空,推出“星云假说”;勘察神人,奉献“三大批判”。所以,自由的思想面对时空,既可能是面对自己所亲历的时空,也可能是面对经由间接经验而想象的时空。思想者必然被时空所羁绊,但不一定是被其行止所至的时空所羁绊,而是被其认知所至的能力所制约。也因如此,以康德之聪颖天资,也要强调在对“现象”的认知之外,尚有宗教、灵魂、自由等人类认知难以抵达的“信仰”之域。

又不受时空拘限,则是说一方面,自由的思想会凭借思想者的想象,穿越现象界,而遨游在现象之外,染指诸如神灵、灵魂、自由等人类认知似乎不能抵达的领域,对其作出形而上的求索。所以,尽管谁也说不上神灵的模样,但也不能否定人们对神灵的各种假说,不能否认惠能、玄奘、奥古斯丁、阿奎那等对神圣世界的潜心探究。所以,“先天”之处即使不是知识认知的领域,也应当是思想瞻望的领域。另一方面,则指一种真正的思想,其功能和作用会穿越时空,进入人们的生活世界,慰藉人们柔软的心灵。譬如人们因为现象的重负而苦恼,却因为老庄清静无为、因任自然的思想教诲而得以解脱;人们因为死而恐惧,但因为佛家灵魂转世、凤凰涅槃的思想教诲而慷慨赴死、视死如归。

无论面对时空,还是不受时空所拘限,自由流浪的思想,对思想者而言是一种遭遇,对思想的接受者、运用者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种遭遇?思

想者因为遭遇时空,流淌出如王阳明、笛卡尔般“我思故我在”的自恋;突兀起如孔丘、苏格拉底般“认识你自己”的冷峻。接受者因为遭遇思想,不但改变其认知方式,还有可能改变其人生航向。这就是自由流浪的思想从发生、发展到精神实用的过程。如果对思想附加过多的人为制约,自由流浪的思想可能反倒被关进黑暗的囚牢,思想带给人们的,反而不是火和光明,而是夜和黑暗。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一直愿意以流浪者自许。我一个博客的昵称,就用流浪者。喜欢我的某位读者在解说这个昵称时,说我身上永远保持着一种乡土气息和泥土芬芳。我不否认,这确实是我一直以来的一种情怀和追求,但这只是一种思想和时空遭遇的欲求方式,这种方式即便是“可欲”的,也不一定是“可求”的。所以与其刻意寻求乡野的思想路径,不如把思想置于乡野的河流中,任其自由自在地流淌。这样,所谓流浪者,不但是肉身的流浪,更是思想的流浪;不但是行止的流浪,更是精神的流浪;甚至肉身和行止都不流浪,也要一任思想和精神去流浪。因为只有让思想自由流浪,思想本身才是自由的。这样,我们才能把思想置于生命旁边,而不是让思想远离生命、疏离生活,把它定格在遥涯无际的所在;这样,我们才不仅仅是一棵苇草,而且还是一棵“会思想的苇草”。这样,自由流浪的思想才不仅有理性的严谨和刻板,而且有诗意的潇洒和激情……

尽管思想是自由的,思想应当在自由流浪中永葆青春,永葆思想的创造激情和热情,但众所周知,一直以来,自由流浪的思想又是人类史上的稀缺资源。譬如古希腊,不论被当下的一些学术家贴上多么神圣的标签,也不论在当时特定时空下释放了多少思想的光辉和能量,但把异端思想纳入法律制裁体系的做法,终究减损了其更加耀眼的辉煌;至于暗流涌动の中世纪和思想治罪的宗教裁判所,对自由思想的扼杀就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再譬如古代中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取其被近代多数士人认可的一种句读和解释)以及“腹诽”、“非所宜言”等罪名,都把对思想的钳制作为统治的不二法宝。

自由流浪的思想如此艰难,我们还哪能坐下来去细嚼慢咽,主动为思想去设限?既如之,那就任思想在生活的原野上,在生命的溪流中自由地流淌、任性地流浪吧!

又及,此次再版时,特删除第一版第一、三次印刷中《大、小传统

间的沟通理性——当代中国官方与民间的法律沟通》一文。因该文已收入拙著《大、小传统的沟通理性》（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一书中。

谢晖

2015 年 5 月 12 日

学习者，思想者(代序)

大脑为思想而存在，
就像手脚为行动而存在一般。

——题记

老早就想趁着旧世纪将逝，新世纪将临之际，对自己以往的学术活动作出一些必要的总结，但及至动笔，又每每被他事所困扰，不得毕其功于一役。感谢张波君从电话那头传来了本书将获准出版的信息，又使我重拾起这一念头。

—

1964年2月7日，我出生在陇东一个偏僻的名叫谢家坪的自然村。我想，如果不是我在这里写到它，也许这个藏在深山人难识的小村庄（我1981年离开的那会儿只有20户人家，百十来位人口）还上不了国家正式的出版物呢！在那里生活了将近17年，至今闭起眼睛，它周遭的山形水势，仍自然清晰地袭入我脑。

那是一个穷苦的地方，小时候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出去讨饭，最幸福的事情则莫过于当讨要来一两麻袋干馍馍，并从东山上高喊着家里人来接时的喜悦。然而，毕竟，在它的方方圆圆，曾经出过教人结网渔猎的伏羲（当然，那只是传说中的故事，但和当下浙江、陕西、湖南、山东一带往往将传说中的故事当做真实看待，甚至以之为“招商引资”之诱饵相比，吾乡人实在太土太“谦抑”）、出过“虎视何雄哉”的秦始皇、出过

“龙城飞将”李广、出过蜀汉辅佐姜维、出过大唐帝国的天子们、出过“富贵于我如浮云”的李白……直至清末，还出过不怕头颅落地，力主诛杀李鸿章的“铁项”朝臣安维峻。

所以，即使如今它的模样变得大多是荒山秃岭，我们在那块土地上长大的人们还是深深感受到它的人杰地灵之伟俊（如今，我可以自夸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以省级区划为界，除西藏、海南和台湾未去，其他都曾涉足。我也发现，不论走到哪里，都以“人杰地灵”来美化本地。相比较而言，在这方面，吾乡人也要“迟钝”得多）。去过当地农家的人，大概会有这样的记忆，在那里，即使家里穷得叮当响，即使自己目不识丁，但如果在家里的“厅堂”能挂一幅文人的字画，则为无上荣光的事。

我不敢说这就是当下先锋文人们所讲的人文精神，但在我眼里，它不失为弥漫于吾乡人们意识世界中的人文气息。正是这种气息的浸染，我们那个小山村在恢复高考制度之前，就有多位大学生。恢复高考制度以来，也至少有近十位学子走入高校大门，接受深造。也正是这种气息的感染，我从小就受到学习光荣、知识伟大的熏陶。

我的父母未曾上学，七位兄姊中也只有二哥接受过初等教育，拿到过一张初中毕业文凭。但就这样一个缺乏文化教育的家庭，并没有放弃对我学习的期望。父亲虽然只字不识，但他对读书人的尊重和喜爱常常溢于言表。据说我未曾谋面的大伯曾是乡学的老师，也曾教过私塾。每每谈到他，父亲脸上就洋溢着幸福感和自豪感。虽然，他缺乏识书断句的能力，但老人家因善良的处世为人、顾全大局的待人接物以及关注经验、能给后生们的农事活动以言传身教的实践智慧，得到了乡邻们的普遍尊重和爱戴。我是家中的“老生胎”（吾乡长辈对其最后一个孩子的昵称），及至我成长的时候，父亲为了操劳一大家子人的生计，每年春节前后，总要远赴青海、甘肃西部一些地方做“生意”或讨饭。有一年，在来回的路上，终因偷偷搭乘的货车难以抵御凛冽的寒风而得伤寒。此后，一旦冬日到来，便成天咳嗽不止（1982年腊月12日，慈父终因此症不治而离开他一生呵护的孩子们）。令他高兴的是：在去世之前，他所有的孩子们，特别是远在外地、多年未归的三姐在家里人不便给她传递消息的情况下，突然回到家，令大家在担心、悲伤的日子里喜出望外。我则在西安接连两天梦见慈父仙逝。那两天，习惯早起的我却把头闷在被窝、卧床不起。连着两天如此，同舍从未见过。当他们好奇地揭开我的被子时，

我则泪流满面,哽咽着告知详情。当天下午,就接家中电报:“父亲病危,速归。”第二天傍晚七时左右,我一回到家,就直扑父亲身边。老人家抬头看了看我,说:“孩子,我等着你回来。”接着,我用从西安买来的茶叶炖了他最爱喝的“罐罐茶”,削了他最爱吃的雪梨,还喂了块他以前未曾见过的蛋糕。茶,他喝了半杯;梨,也吃了半牙儿;那一小块蛋糕,则全吃了下去。随后,他拉着我的手说:“我的孩子,你乏(累)了,去东面(房)缓(歇)一会。等到你来了,我也就放心走了。好好学习,好好孝敬你妈。”这就是他留给我,也是留给他所有子女的遗言。当夜,慈父就永远离他的儿女而去。在吾乡,“老生胎”一般都是父母所“昵”爱者,而我则是因病被父亲弃而复得的孩子。小时候父母亲经常告诉我一个惊险而又辛酸的故事:在我不记事的那会儿,身体总是柔弱多病。有一年我疾病缠身,父亲抱着我到15华里之外的一个较大的村庄看病。医生经过望闻问切,告知父亲:“赶快抱回家吧,孩子没救了。”于是,他抱着我,疾步绕过一条条山梁,穿过一道道深沟。其中到一个深沟时,我已经浑身乏软,两眼紧闭,连哭闹之力也没了。父亲以为不行了,就把我放在沟里草丛中,他则掉着眼泪艰难地爬上另一座山梁。到了山顶,又不忍心地回过头来望了一眼沟底,隐约看见放我的那片草丛在动。于是,他又奔跑下山,在草丛中把我捡回家。经父母精心照料,我居然活了过来,后来在他(她)们的悉心教育和热切期待中,我居然能成长为对法学有点发言权的学者,真是人生难料,世事难断。但回想我的成长,孔圣的那句名言:“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似乎能够切中我的经验和感受。

在兄弟姐妹中,对我的学习影响甚大的则是我的大哥。大哥比我大一轮,他进学校的门还不到一年时间,就因家境困难而辍学。到8岁那年,正赶上国家3年困难时期,吾乡更是饿逝者的新坟常现。于是,他不得不独自一人踏着积雪,远赴榆中(靠近兰州的一个县,彼时生活状况较好)讨饭。大概一年左右没音信,父亲因万分疼爱的长子归来无望,郁闷寡言。忽一日,邻居大哥跑来告诉父亲“让海(我大哥的名字)回来了”时,父亲竟在炕上埋头唏嘘(长辈对晚辈的批评、埋怨)了他几句。然而,当他抬头看时,已经9岁的长子真的站在他眼前(那种情景究竟是如何样感人、如何样催人泪下的,可以想见。我不时闪出这样的念头,把那段故事请作家写成小说,但可惜至今没有实现)。此后,一个儿童就担起了本该由成人负责的家庭重担。虽然,大哥没读过几天书,但他凭着坚强的毅力和信念,竟能没有障碍地阅读古典小说。更令我们佩服的是他的

口算能力。在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的那一阵子,社(公社)、村干部们给每家丈量当天完成的土方量,他们的算盘居然没有大哥的口算快。于是,干部们干脆丈量好了请大哥来口算。在我上小学那会儿,正是大哥所讲的一个个动人心弦的故事吸引了我对书籍的注意,对学习的渴望和热情。当然,此后读的书大多属于文学之类,也想因此做一个在那个时代年轻人都向往的“文学青年”,但终因我的形象思维能力太差而未能如愿。除了大哥,还有对我的读书寄以热望的四姐、四姐夫、五姐、五姐夫。我后来上大学的盘缠,基本由他(她)们和两个哥哥共同负担。

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学校和老师。在我读小学和初中之际,正值城里的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锻炼。那段经历,对于他们而言,也许是极大的不幸,但对我们这些穷乡僻壤中渴望学习的孩子们来说,则是莫大的幸运。就学期间,从县城到我校的彭老师耀增先生,作为全县最好的语文老师之一,手把手、心交心地教我们成长,给我们鼓励。我的写作兴趣,则完全是他在班上把我的习作作为范文念给同学那会儿树立起来的。至今他的一言一笑在我脑中历历在目。虽然,彭先生对我那么多鼓励,但是我记忆最深刻的则是因为我写的8页大楷太难看而被他当众撕掉并令我重写的情景(至今我的字写得还是很一般,这只能怪自己在这方面的天分太有限了)。俗话说:“严师出高徒。”我虽非彭师之高徒,但他温和而又不失严厉的做法,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受用终生。王老师润成先生,也是从城区附近条件较好的地方下放到我们山区来的。他对任何学生都是那样诚恳、坦率。他对我以后学习的影响真是难以估量。记得有一次,他在我就学的那所学校的苜蓿地里津津有味地看书(我小学和初中时的母校名为“何家坪学校”,据说她是全县山区建立的最早的学校,创建于1917年,至今已有84年的历史。学校建在两条在黄土高原地区常见的沟壑之间,学校及其往下延伸的苜蓿地就像一个深入两条沟里的半岛。学校在“半岛”靠“陆地”的那边;而苜蓿地在“半岛”靠“海洋”的那边),我则爬在地埂上面的学校围墙上偷偷看他阅读的是什么书。后来,他发现了,招呼我下去,告诉我《文史哲》是他最喜欢看的刊物(当时他就在看《文史哲》。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刊物”这个词)。他鼓励我将来也要读读《文史哲》。后来,等我上了高中之后,用大姐曾偷偷资助我的20元钱,订了一份《文史哲》。这份刊物直到我上了大学之后还一直在订阅(我也弄不明白,是不是这个前因,使我放弃了江南多所学校而选择了孕育《文史哲》的地方——山东大学,如今,我荣

幸地成为该刊的赠阅者,也成了她的作者)。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978年初夏,我敬爱的彭师和王师两人同时调离我校。最后走的那一天,是我和我的堂表弟(我一个堂舅的儿子。据说,他后来在新疆大学拿到哲学硕士学位后,在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工作。我经常去青岛,却至今未曾在那里和他谋面)一起用自行车推着两位恩师的行李爬上近20华里的山顶,送他们离开的。此后,曾见过彭师三两面,而王师却至今未见(作为他的学生,我深感内疚!据说,他多次打听我呢)。屈指算来,时光流逝了23岁,彭师已经离休多年,而当年正值少壮之年的王师也该到退休的年龄了。至于我这个过去总喜欢往前看的学生,也越来越自觉、越来越习惯于回忆往事了!

到了高中学习阶段,一方面,我面临着艰苦的生活磨炼。我上学的那所中学叫“安远中学”(在小时候懵懂无知之时,以为“毛主席去安源”的那个“安源”,就是此安远呢),距我们村子大概40华里。在上学的两年时间里,基本上每周回一趟家,挑一小筐土豆作为每周的生活盘缠。在两年的高中学习中,我只带过3次母亲给我手擀的面条。每次所带一般能吃3~4顿。后来,快到高考前夕,大哥又给我送过一次面条。除此之外,还吃过半周面条,那是已经率先搞土地承包的村子里的一位同学(他也是我初中的同学,后来考取甘肃工业大学)因所带的面条泛酸准备要扔掉时,在另一位张姓同学(他同样是我初中同学,过继给其叔父,现顶替其叔父的工作而在一个企业就职)的建议下送给我吃的。除此之外,我高中的生活几乎是靠蒸熟的土豆再搅和少许玉米面而度过的。所以,至今我对土豆仍怀有浓烈的感情,虽然吃多了胃很自然地抵触它。另一方面,不论家庭,还是老师,都对我的学习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在此期间,贾老师让先生使我不仅成为一位好学青年,而且培养了我从事学术研究的兴趣。贾师原先是“文革”前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讲师,后来因命运的捉弄而在家乡做了一名农人,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学业。1980年前后被安远中学请来教高中语文。有幸成为他的弟子,是我后来在事业选择上的关键。记得当时不论是我在课内还是课外所写的作文,他都要认真地批改,并且还与我诗唱往还(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有一回,我写了一首《发奋》的诗附在作文后面,其中有一句是:“誓嚼千卷成稀泥。”他看后热情地回赠一首云:“学无止境生有限,前程似锦干劲添;山盟海誓交红卷,韦编三绝铁砚穿。”)。他对我私下的或者公开的鼓励,是我自信地学习和创作的动力。另外,还有贾师的同乡,教我们数学的张

老师耀根先生。和语文等文科课程相比,自从上学以来,我的数学总是不上不下,但是,张师却因我刻苦的学习和钻研精神而把我的学习方法讲给我的同学及我后来的校友。至今回到家乡,碰到同学们谈起我当时的学习情景时,还津津乐道于张师对我的欣赏和鼓励。考取大学后,两位恩师都曾见过一面,后来贾师还给我写过一封信。如今,贾师当是80岁左右的高龄了,张师也快到花甲之年了。听说贾师的苹果园至今仍花果飘香,我真想再与他、与张师一起,漫步在浓荫密布的果树下,向他们汇报、向他们请教!

二

1981年夏,是个多雨的季节,也是个盼望的季节。到了夏末,村里人终于在乡广播站的广播中听到了我被大学录取的声音。据说广播员在播送该消息时,还代表乡政府特意向考取的学生及家长表示祝贺。全村人都非常高兴,我的亲人和老师们更不用说。记得当时只有十一二岁的堂妹看到我从村外归来,像小燕子般跑来告诉我喜讯。她还说,她已经在村子里上上下下跑了好几趟,告诉乡邻我考取大学的消息。是啊,人们应该高兴,那时毕竟在一百个考生中才能考取不到4个。至于边远的农村地区,恐怕远不是这么高的比例。

考取了大学,既让人高兴,又让人发愁。发愁的是上学必要的铺盖穿用,还有全国通用的粮票。前者可以通过大家相帮相助解决,而后者对土生土长的乡里人却是个难题,因为首先要从吃“公家粮”的人那里借到地方粮票,然后再兑换成全国通用粮票。经过努力,地方粮票终于借到了。但能够用地方粮票兑换通用粮票的地方,却远在40华里之外。更严重的是该地在渭河南岸,而我们在渭河北岸的山里。要是在平日里,这根本不是问题,然而,滂沱大雨却在没完没了地下着(这时已经持续了20多天)。要去兑换通用粮票,除去倒爬着“走”下山外,还需要趟过湍急的渭河。而这个任务,落到了我的一个堂哥身上(他已经英年早逝,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多年,但愿他在天之灵能感到我对他的深切怀念)。我不知道他一路上是怎样跋山涉水,换来那30斤通用粮票的,但我的经验告诉我,他是冒着生命危险去为我兑换粮票的(在我本人去安远中学取“入学通知书”回来的路上,要经过一个被洪水冲垮的小型塘坝。走在坝堤上,忽然脚下一软,半个身子都掉进泥淖里。当时的感受是:吃力地抬抬左腿,右腿在往下陷;抬抬右腿,左腿在往下陷。正在无望之际,我的一位李姓同学——他就是我这位堂哥家嫂子的内侄,后来

参加了军,并在部队上考取了大学。据说现在仍是一名军人——来挑水,他看见我,急忙喊来村里人。村里人拿着绳子和扁担,硬是把我从泥潭中拖了出来。要是他不及时出现,我此刻又能在哪里呢?!))

雨还在下着,通往西安的陇海线的“盲肠段”——天水—宝鸡段也被大水冲垮。我只能坐汽车绕道六盘山,再到宝鸡转乘火车。然而,坐汽车也是难事!我记得,当时大哥、二哥和村子里的其他人搀扶着我到了70华里之外的县城,然后大哥乘火车送我至天水(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此前,我居然不知道客车有无棚子,并因此而向大哥询问)。这时天已经摸黑了。在人生地不熟的天水一路打听汽车站,终于打听到了,但根本没有平日里我们所见的那种班车,通往宝鸡的“客车”全部是大卡车上做一个帆布篷。不得已,大哥还是送我上了车。车开动了,大哥在后面紧迫着,最后立在一根电线杆下。借着灯光,我隐约能看见他孤单的身影,直到车转弯(后来,他告诉我,他一直盯着车上那对隐约反光的眼镜,直到车消逝在雨帘。回到家他又后悔,为啥没送我到宝鸡)。车一路颠簸着,最险的路段当数国人都熟悉的六盘山。以前从未出过我们县域范围,这一次在来往陕甘宁必须经过的六盘山时才领略了什么是车水马龙。一路上,借着汽车的灯光,不时可以看见翻倒在路边的各类汽车,并且有些是刚刚翻倒!第二天凌晨4时左右,提心吊胆的“公路之旅”终于结束,我到了宝鸡站。当时买了张火车票,就倒在自己的行李上睡着了(那时社会秩序尚好,身上带的一切完好无损)。约摸8点左右,我又上了火车,大概下午两点钟左右,终于到了我日思夜想、梦寐以求的大学——位于西安南郊的西北政法学院。

我考取的是该院的法律系(那时,该院还有政治理论系,含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两个专业)。说老实话,当时我对法学丝毫没有兴趣。其原由是这样的:在我准备离开家乡,远赴西安求学之前,曾到一位大娘家告辞。她问我:“孩子,将来出来(毕业)之后做啥的(干什么工作)?”对此,我丝毫不知(因我的志愿是我的班主任、教化学的颀老师正生先生替我报的),竟无以应对。末了,那位斜躺在大娘家炕上(在多雨的夏天,山里的气温往往很低,所以,在大娘家炕上的几个人还盖着被子)的大队(现在称行政村)党支部书记轻蔑地替我解了围:“还不是用绳绳绑人的。”无论如何,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话在当地还是非常权威的。所以,当时我的感觉是:学法律并不是件光荣的事,反倒如此耻辱!因为即使在那个刚刚结束动乱不久的年代,用绳绳绑人的人在纯朴的乡民中也是要遭人白

眼的。更何况我当时的身体单薄得就像‘细麻绳’（后来，一位张姓女同学——她现在在西宁工作——给我起的外号，大概是她听说了这个故事后说：“细麻绳正好绑人啊。”于是这个并不好听的外号也就很快传开了）。这样，到了学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转到我最钟爱的哲学专业去。这个念头大概在开学典礼上听了一位从事哲学的院长的讲话后才有所改观。他讲道：“学法学的同学们，你们将来是祖国亟须的治国之才……”在听到这句话的当儿，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吾乡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话。一个说学法律是用绳绳绑人的，另一个则说学它的就是治国之才。我究竟何去何从？我个人的秉性，向来是尊重学者的。在潜意识中，对思想导师的崇敬完全胜过政治领袖（尽管我知道，这其中肯定会存在谬误）。但是，作为农家的孩子，我也深知，在广阔的农村，那些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中，能人多的是，有深刻见地的人是许多被偏见（当然，不是加达默尔所说的“作为理解的条件的某种‘偏见’”，而是一种迂腐之偏见）所包裹的城里人所不能想象的。了解了这一层，则读者诸君对我当时的片刻彷徨会完全理解。不过，很快，我经过自己的判断，就认可了王老师陆原院长（他已经逝世多年，在校期间，我从未与他单独交谈过，但有件事记忆颇深：在有一年校教职工书画展上，王老师用浑厚的笔墨写了首诗，其中一句是：“剖开我心众人看。”由此想见，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作为“重灾户”的政法学院的人际关系对他的困扰）的话。这样，转专业的事首先在我这里就没了下文。

上述关于法律、法学和法学人才之功能的不同说法，不仅使我有了一次想转专业并很快打消了这种想法的经历，而且进一步激发了我性格中本来就有的怀疑精神和独立意识。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习法学者应当是善于执两可之辞、逢左右之源者。我想，这种情况大概在众多的习法者中不能排除，但它与法律和精神恰恰背道而驰。不要说现代法律，即使在古代法律中，追求明确、肯定、统一，是法律的共同属性（虽然，这一理想的实践效应往往是不尽如人意的）。法律的此种特点给习法者带来两种倾向：一种是呆板、保守的习法者，他（她）们更适合于从事法律实务；另一种则是怀疑、开放的习法者，他（她）们更适合于从事立法或者法律的学术研究。这两种人，都与模棱两可或左右逢源格格不入。

尽管有了从事学术活动的兴趣，有了向一个思想者靠拢的念头，但至少在校的前两年内，我的阅读范围还主要是文学、哲学、经济学和史学书籍。那时，正是中国“伤痕文学”余韵仍存、“改革文学”、“反思文